

反叛与建构:女性文学创作的双向主题

向怀林¹, 彭熙²

(1.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 重庆 400039; 2. 重庆工学院, 重庆 400050)

摘要:通过对女性文学现象的分析,指出了对传统的叛离和对新的创作语系的建构,是女性文学创作发展的两个最基本主题。

关键词:女性文学;传统;创作语系

中图分类号: I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2)05-0039-03

Rebellion and Construction: Alternative Subject for Women's Literary Writing

XIANG Huai-lin¹, PENG Xi²

(1. Chongqi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9, China;

2.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0, China)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the analysis on women's literary phenome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system of writing are the two basic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literary writing.

Key words: women's literature; tradition; language system of writing

毫无疑问,女性文学的兴盛与风靡,已成为中国文坛时下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当曾经十分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的传统经典“严肃作品”被呼啸而至的商品大潮与躁动不安的人流冷落在历史的喧嚣之后,各种大众化文艺消费品和亚文化消费品成为时尚和潮流,女性作家却以前所未有的斑斓与另类在文坛上建构起蔚为壮观的创作景观并引起社会空前的阅读兴趣。在人们的商业意识日渐厚重而精神家园日渐远去的今天,这一景观的出现着实令人振奋与鼓舞。

对这一景观进行大致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对传统的叛逆和对新的创作语系的建构,是女性文学创作发展的两个基本主题。

一、女性主体意识和生命欲望在传统文学创作语系中“浮出历史地表”,“我”成为叙事主体和表现中心

历史地看,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一部女性主体丧失史。长期以来,女性在文学创作中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和本体欲望被强大的男权中心社会意识、叙事语体所覆盖,只能充当女扮男装的叙事角色。因此,在传统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我们很难发现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价值取向以及具有性别特点的语义体系。女性文学作品的存在,仅仅是作为被异化的男性角色的派生物和公共语义的熟悉面孔陈列在历

史文化长廊中,换言之,女性文学作品体现的是一种男权社会的精神取向和价值形态。这是历史对女性的扭曲。五四时期,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曾经为女性文学创作带来耀眼的一闪,“我是我自己的”成为千年一吼,然而,这种理性的光芒随即便消失在强势政治意识潮流和男权语境中。40年代,苏青的《结婚十年》和张爱玲的《金锁记》等所谓“欲望叙事”作品虽然表现出女性性别取向的较强意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作品的意义更多地表现在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尊重与解放的呐喊与追求上,也即是说,就作品的基本倾向而言,它并没有脱离当时历史的主流价值取向,也没有形成有别于主流创作语体的独具特色的创作语体。同时,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集中在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两方面,这些作品不大可能引起人们的过多注意,更不可能形成文学潮流。在以后的几十年,女性文学和整个文学创作一同沦为强势政治的工具,成为政治概念、精英理想的载体,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80年代初,在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取向进行多元化探索的思想启蒙大环境下,女性作家开始重新寻找、发现自己。铁凝的《玫瑰门》、《对面》,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其中,《玫瑰门》和《岗上的世纪》可以看成是后来女性文学开创“性”、“情”时代的奠基作。在这些作品中,传统的以男权价值观念

收稿日期:2002-07-03

作者简介:向怀林(1953-),男,重庆人,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行为科学研究。

为中心的把社会理想作为叙事主体的创作重心开始向“明白的欲望和粗鲁”(《对面》)的人的生理本能与心理欲望这个“无法逃避的”领域转移,“将那些曾经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把两性关系从温情、体面的婚姻与道德的窠臼中拖扯出来,骇然直面“性爱”,从而把人的问题摆在了历史面前,令人震撼和深思。通过这类作品,我们开始窥视到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独特的个体感悟与生命欲求。亦如陈染所言:“对女性来说,性的觉醒就是思想的觉醒”。可以说,这些作品开启了女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思想启蒙运动。90年代以后,物欲主义进一步动摇了男权中心政治话语的桎梏,女性文学创作开始进入刻意追求表现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情调与内容的阶段。开创这一阶段女性文学之风的代表是陈染、林白与海男所谓的“新三巫”。她们的作品以固执地立足于女性“个性视角”,刻意追求内心独特“性情”而在文坛上大放异彩,效仿者不绝其尘,从而揭开女性文学“性”、“情”时代的序幕。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书商的炒作下,开启了一大批“绝对隐私”作品的滥觞,同时也洞开了文学创作和商业包装、炒作、联姻这种亚文化现象的潘多拉之盒。这种极力张扬女性特点、大胆表现自我的创作模式在90年代后期愈演愈烈,仿佛沉睡千年的女才子们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猛然觉醒,一时,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女性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上争妍斗奇,妇女红遍整个天。“在这些小说里,女作家似乎就是‘我’,所有的口吻是一致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要以自己的故事吸引读者”。她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染的《私人生活》、《声声断断》、《无处告别》,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海男的《女人传》、《我的情人们》,铁凝的《大浴女》,王安忆的《富萍》,池莉的《口红》,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一个流浪女的未来》,皮皮的《比如女人》,王荒的《什么都有代价》,卫慧的《蝴蝶的尖叫》、《上海宝贝》,棉棉的《啦啦啦》、《糖》,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彼岸花》,周洁茹的《小妖的网》、《长袖善舞》,赵波的《心空》、《情色物语》,九丹的《乌鸦》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摒弃宏大叙事与厚重题材,把女性自己推向表现的前台,将创作的重心移位到女性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及本体欲望,以空前的反传统姿态,把笔触深入到女性生存状态深层结构中的“生理场”和“情感场”,大胆描写女性生理的、心理的、感觉的广阔空间,把“性”、“情”和人的本能欲望作为审美主体和叙述主体,追求生命的放浪不羁和情感的自由自在,从肉体到灵魂表现出强烈的反叛精神。尤其是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其叛逆矛头不仅指向束缚自我的传统,同时也指向栖息在现实中的我。她们所追求的,似乎只是游离于现实与虚无之间的自由精灵。女性文学创作对叙事主体的大胆突破和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领域的涉足,意味着男权话语体系大一统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统治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以社会精英理想为表现目的,以客观再现为表现方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格局的终结,使文

学创作重新走向“人”的起点,并使文学创作朝自身的多元化纵深发展具有了可能。换言之,女性文学创作是以叛逆者和终结者的身份走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前列,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朝向自我发展的一次新的开始。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向我们提供的大量可咀嚼的阅读文本,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我们身在其中,却又常常感到无能为力传统和权威的蔑视与否定。从这个意义讲,它给我们带来的社会意义上的认识作用远远大于文学方面的冲击力。另外,女性作家在多姿多彩展示女性自由意志、生理需求、生存状态,远离传统经典文学的说教和精英意识的同时,丰富、扩展了文学创作的认知疆野、创作领域与审美范畴,从这个意义讲,这种特点带来的成果也是空前的。

二、“私人空间”和“个人化写作”成功地建构起女性文学创作的话语平台和语义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由面到点、由外向内的多元化深度发展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中国的文学创作长期以来为“礼”、“义”、“道”、现实政治等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强势语体所支配,女性文学创作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即使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对女性群体的人格关注,如“娜拉走后怎样”那一场颇具声势的讨论,也是由觉醒的男性站在普遍的人性的立场上对同类投去的一瞥,谈不上女性的自我觉醒。正是由于性别角色的压抑和对长期以来的不平等地位的反弹,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鼎盛于9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长期作为弱势群体对男性强权社会观念的冲击与挑战。如《玫瑰门》中司猗纹用“露阴”对道貌岸然的男权社会的沉重一击;《对面》中肖禾与窗外那个女人用鲜活、美丽的肉体对“我”的嘲弄;《荒山之恋》中金谷巷的女孩对现实的不屑以及《岗上的世纪》中李小琴用粗野和疯狂对“性”的诠释,直到90年代所谓“美女作家”群对情欲的泛化和对肉体的随意都可以看到这种性别对抗的明显倾向,这是女性心理结构中典型的自我补偿情结。长期以来,两性禁忌是男权社会最典型的特点,“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女性性欲的禁锢较之男性来说要严重得多,而且由来已久,盘根错节”。在这种禁忌的森严中,女性的性别意识被排斥在社会生活甚至女性自己之外,成为男性的私有附属。由于这个特点,“妇女解放和女性革命运动的同时萌生,并非纯属偶然的巧合。”因为,女性的觉醒,女性的个性要求与人格尊严,必然要以对男性特权的否定和对缺损的女性意识的修复和扩张为前提。在女性文学创作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这种一开始就带有明显性别对抗色彩的女性文学创作注定了传统文学创作话语平台的裂变:大一统的男性话语平台的解体 and 女性话语平台的建构。这种潜藏在女性作家群中的对性别的修复与扩张的欲望在裂变中寻找着自我,这种寻找的结果,是带有明显女性特点的“私人空间”和“个人化写作”模式的出现。这种创作模式的集大成者是九十年代名噪一时的陈染与林白。

所谓私人空间和个人化写作,即是从个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他们的姿态是绝对自我的存在。“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的基础上”,大体上说,她们的创作视点迥异于传统的“向外”而立足于“向内”,聚焦于“我”这个主体上。在叙事手法上,不在乎事情的“完整”与“连贯”,也不追求细节的展开,追求的只是个人对外界的独特感受和情绪的瞬间变化。按陈染自己的说法,个人化就是“把写作的立足点放在个人或者叫作私人这样一个很小的元素上”,“没有进行宏大叙事”,“没有去写时代历史的什么洪钟大吕主旋律”,只是“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在一个很小的位置上去体会和把握只属于人类个体化的世界”。这种“‘无关他人’,‘无关社会’,不为时代立言,也‘不试图整体反映时代现实’”,“叙事仅仅是个人经验,个人性情,个人情调基础上的艺术想象”的创作方式带有鲜明的个人经验主义和孤傲的贵族化色彩,这正是女性对自我意识修复与扩张的极端化结果。如果非要探寻其形成的动因,深层的原因应是:重新发现自我的女性意识对长期禁锢自己的男性强势话语平台和传统文学创作模式的本能出逃与反叛以及女性生存经验、生理特点对创作模式自我选择的合理契合(对男性话语体系“宏观”、“群体”、“主流意识”、“完美”等特点的否定和“私人空间”、“个人化写作”与长期处于幽闭生存状态的女性含蕴、内向、情绪化生理特点、心理特点的一致性);外在原因是:现代文明的强劲冲击使本土传统观念日渐稀薄以及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文艺理论和艺术作品的大量登陆(社会对这种话语模式的包容,现代经济社会功能理性原则对文化领域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要求以及西蒙·波娃、贝蒂·弗里丹、弗吉尼亚·伍尔夫、波莱娜·西苏、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等人的文艺观和创作风格对女性作家群显而易见地影响)。尽管这种创作模式带有强烈的极端化倾向和排他性,但陈染、林白的作品仍然以无与伦比的个性色彩和性别色彩令人眩目。“个人化写作”模式在经过商业包装和炒作后,近乎掀起一场文体革命,女性作家大量介入与摹仿,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这些显得十分“另类”的作品以前所未有的主观色彩和聚焦角度把女性长期被压抑的性别意识,生存经验,个体感悟通过优美、细腻、新奇的文字表现出来,直达人性的深层领域,给人带来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灵震动。这种模式的出现,把人们的视角从传统的对现实生活的“宏观”把

握转移到“个人”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这个点上,使读者从这个点上能够更深入、更强烈地触摸到个体对现实的细微感知和独特感受,增强了阅读的近距离和亲切感。同时,女性作家在对传统文学创作的“宏观”和“重大”视角移位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进行深及入髓的剖析与诠释过程中,把人们已经习惯了男性视阈移位到全新的以女性意识、女性视角为中心的位置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认知感受与审美愉悦,从而成功地建构起女性文学创作的话语平台与语义体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以其成功建构以现代白话文为文本的创作话语平台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说,女性作家建构的以个人题材、主观叙事、粘附大量时尚与潮流信息的创作话语模式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话语平台与语义体系的建构,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多元化格局的开始,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意义上的量和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所孕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具有的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创作活力与价值期盼。这一切,正是时代和我们所需要的。进行这样的评价和定位,有助于我们对女性文学崛起现象的合理解释,也有助于对这一现象的恰当评价。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这种以主观诉求为核心,以自我体验为基础、以张扬个性为特点的语义体系不仅弥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表现主义创作潮流在以后大半个世纪中的失阙,从而使曾经长期沦为政治工具和理念说教的文学创作重新回归到朴素而真实的人的位置,而且它比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更高地概括了人与现实的能动关系,从而为文学创作朝自我的纵深发展拓宽了视野。综上所述,女性文学的兴起虽然有其时代文明的铺垫,但其承上启下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参考文献:

- [1] 金文野. 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J]. 当代文坛, 2000, (5): 47-49.
- [2] 王安忆. 荒山之恋[M]. 北京: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 [3] 林白. 记忆与个人化写作[J]. 作家, 1997, (7): 59-61.
- [4] 赵波. 做女人容易, 做女作家更容易[J]. 海上文坛, 1999, (6): 81-84.
- [5] 珍妮特·希伯雷·海登, B.G. 罗森伯格. 妇女心理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